

Diplomacy

欧洲的智者 德国前总理

施密特 大国和它的领导者

Menschen und Mächte

■【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著

■梅兆荣 罗国文 王熙敬◎译 梅兆荣◎校

他们如何决定世界的未来

他早已远离国家权力中心，但他的声音依然备受世界尊重，
他的预言不断被这个世界印证……

Diplomacy

施密特 大国和它的领导者

Menschen und Mächte

■【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著

| 梅兆荣 罗国文 王熙敬 ◎译 梅兆荣 ◎校

Menschen und Mächte

by Helmut Schmidt

Copyright © 1989 by Helmut Schmid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lmut Schmid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8 海南出版社

本书中文版由赫尔穆特·施密特授权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07-17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施密特：大国和它的领导者 / (德) 施密特
(Schmidt, H.) 著；梅兆荣，罗国文，王熙敬译；梅兆
荣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443-3230-9

I. ①施… II. ①施… ②梅… ③罗… ④王… III.
①施密特, H. —回忆录②国际政治关系—研究③政府首脑
—生平事迹—世界—现代 IV. ① K835.167=6 ② 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998 号

施密特：大国和它的领导者

作 者：(德国) 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译 者：梅兆荣 罗国文 王熙敬

校 者：梅兆荣

策划编辑：黄宪萍

责任编辑：陈 波 孙 芳

装帧设计：嵇倩女

责任印制：杨 程

印刷装订：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蔡爱霞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30929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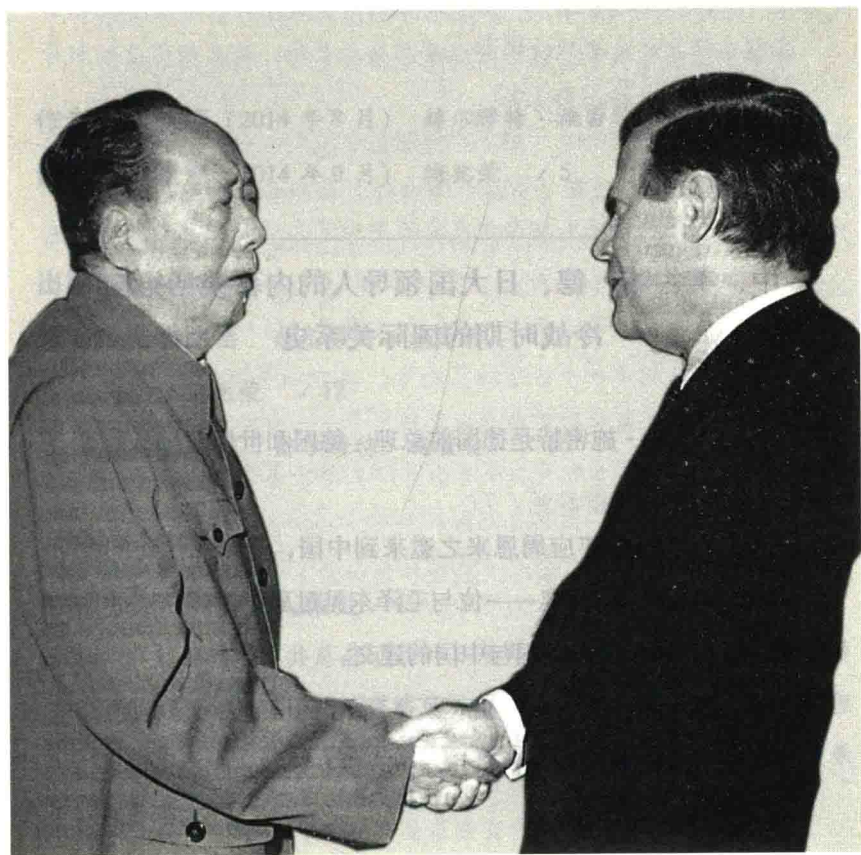
字 数：319 千

书 号：ISBN 978-7-5443-3230-9

定 价：98.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毛泽东无疑是一位世界历史人物：即便他在身体上仅仅是只能勉强支撑，但也绝不能忽视他精神的存在及他思想的活力。

——赫尔穆特·施密特

中、美、苏、德、日大国领导人的内幕谈话纪实 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史

赫尔穆特·施密特是德国前总理，德国和世界政坛备受尊重的前辈政治家。

施密特 1975 年应周恩来之邀来到中国，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他从政期间，积极促成德国与中国的建交。

作者新版前言

我写作这部书时，中国尚未像现在这样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今天，研究中国对西方人而言已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反过来，研究西方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说也是重要的。在我看来，比起德国人或欧洲人，更不用说美国人了，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情况了解得更多。

不过，西方人如果研究中国，会马上明白一点：所有重大的经济、环境政策或地缘政治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不再能解决。在全球金融业的规则问题上是这样，在二氧化碳危害问题上是这样，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地区以及乌克兰这两大地缘政治危机上同样如此。

中国是伊拉克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同时是伊朗最密切的盟友，乌克兰则是中国最重要的军备和粮食供应国。这使中国面临着不同往常的新任务。因为，这个昔日的“中央帝国”几个世纪来不需要同别国交往，缺乏长期的同世界政治打交道的传统。如今，中国不能不对众多的全球性问题采取立场，而西方则必须习惯于只有在中国参与下才能解决这些议题。工业国家的八国集团会议——1975年我和我的朋友、时任法国总统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创立时为六国集团——今天已经不合时宜，尽管今年又举行了没有俄罗斯参加的七国集团会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该集团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50%，占世界

上人口比例不到 15%。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绝大部分来自该集团之外。就当今的多极世界秩序而言，二十国集团才是真正的框架。二十国集团是 2008 年 11 月才开始在政府首脑级举行会议的。中国在该机制中理所当然扮演着核心角色。

当我 1975 年第一次访华时，这些都是无法预见到的，尽管我那时已确信西方低估了中国的重要性。当时，我对上下 4000 年的中华文明已深感钦敬。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产生于拿撒勒的耶稣基督出世前约 2000 年，是刻在龟甲上面的。至于哲学、文学、自然科学、技术和医药，中国人曾长期领先于欧洲人。直到 16 世纪，中华文明和中国科学家还走在欧洲的前面。后来，中国停滞了，而欧洲人发展了一种名叫民主的东西，接着便是工业革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殖民列强撤出除港、澳之外的中国以及帝制崩溃之后，中国人才得以投身于自己伟大国度的改革和复兴。

毛泽东以十分执拗的方式，在老百姓做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试图实现改革和复兴。毛是一个套不进任何范式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工业无产阶级，而毛在“大跃进”中却相信农村的农民无产者。他还在“百花齐放”中相信工程师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信青年人。但他尤其相信革命，相信能够使这个富有传统的大国快速实现现代化。在他生命的末期，中国还是重新登上了世界舞台。不是毛不得不前往美国，而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去了中国，以便与中国结成反对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人与之吵翻了的苏联的同盟。

但与此同时，美国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发明了他们现在称之为“保护的责任”的玩意儿。他们的意思是保护其他国家的人权。然而，人们从来弄不准这背后是否隐藏着他们自身的强权利益，还是真的要施以援手，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概是二者兼而有之了。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时，他们不仅把德国从阿道夫·希特勒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而且也强大得足以最终接管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经过这场战争，英国对美国负债累累，以至于美国人得以规定英镑对金本位的汇率。他们为德国选择了一个有利于出口经济的汇率，而为英国选定了一个非常不利的汇率。这个汇率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从而使英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速度比德国缓慢得多。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21世纪头十年，美国这个新的世界大国在“保护的责任”口号下进行了为数众多的战争。第一场是朝鲜战争，以朝鲜共产党人和中国人一方，韩国人和美国人为另一方作战。战争导致朝鲜分割，90多万士兵和大约300万平民丧生。接着是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90年代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以及21世纪初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最后这场战争，甚至德国也参加了。当时的德国联邦政府强调，“在兴都库什山，也是保卫德国的安全”。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现在不仅是美国人相信，而且欧洲人也确信，西方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中国人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比如阿拉伯世界，自然不吃这一套。他们愿意接受工业化，准备适度地接受资本主义，但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毫无规则可言的美式金融资本主义，那里私人银行捞取利润，国家却不得不为银行毫无节制的金融产品所造成的损失埋单。

但是，他们不愿意简单地照搬西方民生，不准备接受西方关于人权的想法。对于在自身发展的哪个阶段、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共决权，才能实现稳定的改革而不导致失控的革命性发展，他们更多是有自己的想法。最近在埃及发生的“阿拉伯之春”

也证实了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在埃及，西方的干涉和过于匆忙地引进民主，使人们的日子比过去更难过了。每个国家都必须自行选择自身发展的速度。

如果有人试图在德国取消个人权利，不仅是生存权，而且包括一切个人权利，我即使作为老人，也将赤手空拳奋起抗争。但我绝不会为维护别国的个人权利，而对该国进行干预。我不得不说，现在我对“保护的责任”这个时兴的口号颇感担心。我这样说在欧洲政治中极可能属于少数派。对西方许多政治家来说，这个口号已成为他们维护其正在消失的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而对于一个西方不再能决定游戏规则的新多极世界秩序，西方人学会与之相适应的速度缓慢。我十分希望我的书能为减少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误解做出贡献，并有助于这个多极的世界秩序和平地发展。

赫尔穆特·施密特



2014. 8.

译者新版感言

海南出版社重新出版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施密特：未来强国》、《施密特：与中国为邻》、《施密特：大国和它的领导者》三部著作，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分享这位著名德国前政要的远见卓识，这一举措值得称赞。

三部著作的基本内容，笔者在初版的译者序言中已做介绍。这里，仅想特别指出三点：

（一）在笔者认识和了解的西方政治家中，施密特对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研究、判断和理解，是最全面、客观和深刻的，令人敬佩。

（二）施密特对中国发展变化的观察，特别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评价，没有西方政治家通常有的那种偏见，也没有狭隘民族利益的烙印，他常常以人类进步和国际和平与合作利益为出发点，判断是非，并敢于仗义执言，鞭挞西方一些人的错误观点和态度，实属难能可贵。

（三）三部著作中对许多国际问题表达的独到见解、明确立场和鲜明态度，至今仍富有现实意义，发人深思。

鉴于此，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

梅兆荣

2014年9月30日

出版前言

《施密特：大国和它的领导者》一书，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 1987 年夏天发表的重要著作。它记载了作者自 1969 年担任政府职务以后，特别是在 1974 ~ 1989 年担任联邦总理期间，与苏、美、中三大国领导人会晤和会谈的内容，概述了上个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东西方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以及作者对三个大国以及日本的国情和领导人特点的认识。本书既是与“伟人”内部谈话的回忆录，又是国际风云的纪实，也是一个诠释当年德国外交战略的经典。虽然本书问世至今已有近 20 年时间，且作者在观察问题时难免带有主观性和党派政治的烙印，但今天读起来仍使人感到真切，尤其是作者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和明确的主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应当说，该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也有参考意义。

1988 年，本书作者为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他是“以与美国和苏联同等的级别来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因为这三个大国的政策正影响着整个世界”。这句话不仅说明了施密特对中国的重视，而且反映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必将成功的信念，以及他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敏锐嗅觉。施密特在撰写本书之前曾三次访华，先后会见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他对中国的每次访问，特别是邓小平同他的每一次谈话，

都增进了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以一个外国政治家的视角，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变化。

举例来说：1975年10月，施密特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德国政府首脑，从中国得到的印象是复杂的：毛泽东、邓小平的谈话使他难忘，中国人民的勤劳使他赞叹不已，古老的中国历史和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使他倍感钦佩，即便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而“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使他深感厌恶。1984年施密特第二次访华时，他“有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胡闹”已经结束，中国“已经走上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路线”，“中国领导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比任何其他许多国家领导人更好的判断力”。1988年施密特第三次访华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取得的进展到处明显可见”，“人们自身也比过去快活多了”，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无疑是非凡的。当今“不是经济巨人日本，而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作用越来越大”。据此，他鲜明地提出，西欧“应同中国建立良好的、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基于上述，海南出版社决定出版本书，以飨更多的读者，实属明智之举。

梅兆荣

中国驻德国前大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

2008年4月

作者中文版序言

我感到很光荣，这本书被译成了中文，将同中国读者见面。他们会看到，我是以与美国和苏联同等的级别来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我知道，我的中国朋友们并不喜欢听到对中国使用“超级大国”这个词；他们认为，这个词包含着不能说出口的对别国行使霸权的要求，而北京是拒绝这种要求的。尽管如此，我对这三个国家仍然保持使用超级大国一词，因为与此有关的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今天，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三个大国的政策正影响着整个世界。虽然，还另有许多对世界具有伟大意义的国家：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加拿大、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最后提到的这两个国家如同三个超级大国一样，也是核战略大国，它们同样可以在远离本国边界的地区开战。但是，到本世纪末，对于将要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 60 亿人来说，不管谁在巴黎或伦敦执政，不管新德里、墨西哥城、拉各斯或其他国家的首都推行什么样的政策，它们所起的作用仍将是相当有限的。相反，来自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政府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它不可避免地几乎涉及整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没有戈尔巴乔夫和里根，1987 ~ 1988 年以来就不会有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就核裁军条约达成的协议，没有邓小平和戈尔巴

乔夫，就不可能结束中国人和俄国人相互猜疑的敌对关系，这种敌对关系在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一直给亚洲投下阴影。没有邓小平倡导的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便难于做出仿效中国的决定。同样，这对世界上其他一系列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也是适用的。

70年代初，当我出任我国政府部长时，我就试图使自己对中国未来的作用形成一个总的看法——这在堪培拉、新加坡、东京，美国西海岸以及其他任何地方进行会谈时，都曾经是我关注的最重要的题目。我理解，太平洋沿岸国家长期以来所知道的是：中国释放的影响，与当时我们大多欧洲人想象的相比，要大得多。周恩来的邀请给我提供了在1975年亲眼看看这个中央大国的机会。遗憾的是周恩来已身患重病，无法接见我。我本人——在此期间已就任联邦总理——是访问北京的第一位德国^①政府首脑。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时也很友好，但我的印象却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给了我深刻印象。劳动人民的勤劳使我赞叹不已。数千年古老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使我倍感钦佩。但是，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状况不好，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我认为，在经济上应当把中国看做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克服这种状况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使我深感厌恶。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对人以及对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竟然肆无忌惮地、残忍地进行迫害和诋毁。

1984年我第二次访问中国参加35周年国庆时，我有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我高兴地看到，人们已经结束了这一犯罪的瞎胡闹，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路线。我又

^① 意指当时的联邦德国——编者

一次会晤了邓小平，同样会晤了中国其他一些领导人。再次见到邓小平使我感到特别愉快。我知道，他是对经济开放不断给予推动的人。在我看来，同我在其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那里所体验到的情况相比，他对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更好的判断力。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经济改革过程和使经济管理机制现代化的过程，都还需要很长时间。当然，大街上和城市商店里的景象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明白：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带来进步，肯定也会出现一些挫折，但毕竟它已经走上了正确的方向。生产产量的上升是惊人的，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现在工业也应当跟上来。我觉得，处于优先地位的有三大主要任务：教育和培养大多数人具有首创精神和责任心。通过中央银行建立有效控制货币量的机制，以使价格的逐步放开不致转化成通货膨胀性的发展，建设足够的基础设施，以便可以真正地实际利用从上海到乌鲁木齐之间，以及从哈尔滨或大连到广州之间巨大的内部统一大市场。

这本书是1987年4月脱稿的。当时我写道：“中国的改革路线进行得越顺利，对莫斯科的挑战就越有力。”这句话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因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现在走上了一条类似的道路。北京是在1979年改变方针的，莫斯科路线的变化则是在五年之后。但是，中国时间上的领先并不是使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机遇比苏联改革成功的机遇更大的唯一根据；第二个根据在于苏联官僚主义的惰性，它比中国官僚主义走上墨守成规轨道的历史要长一倍；第三个根据是中国人具有更大的个人灵活性，特别在沿海地区和海港城市。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有有利条件，它是在一个总的生活水平明显地高得多的水准上开始的。与此相反，中国的有利条件在于，它用于军

事任务的耗费所占社会总产值的份额，从未像苏联直到眼前所达到的那样高。把苏联庞大的军备工业转变成生产民用的物资也是一项巨大工程，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任务。

1988年秋天，我第三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处处明显可见。我发现，人们自身也比过去快活多了。他们愉快地生活着，较之70年代中期受压抑的那种气氛，差别是很大的。我在15年内第三次会晤邓小平，看到他对自己国家取得的进步也感到十分高兴。

后人编写历史时将会确认，中国人民应当感谢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是什么。在我看来，邓小平的伟大功绩现在就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我亲身体验过这种功绩。因此，我把去年为《邓小平文集》的德文版撰写前言看做是一大光荣。我对这个人怀有一种友好的倾慕之情，同样对他的人民抱有巨大的同情。但愿他得到幸福！

赫尔穆特·施密特



1989年3月于汉堡

译者的话

本书是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1987 年夏天推出的著作。该书一问世，立即在联邦德国和欧美许多国家引起重视。据出版商公布，到 1987 年 10 月初，在短短几个月内，仅在联邦德国就已销售了 23 万册，成为西方最畅销的政治书籍之一。

施密特是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69 年起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1974 年出任总理至 1982 年。本书是施密特在担任政府职务期间，特别是在任总理的八年内，与苏、美、中三大国领导人会晤和会谈的回忆录。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东西方关系出现深刻变化，经历了缓和、僵持、对抗等几个阶段。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施密特在这一系列变化中运筹策划，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由于作者紧紧抓住当时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东西方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又是以与大国领导人的接触、会谈为主线，因此可以说，本书是 70 年代以来一部难得的国际风云纪实。

在第一部分“同俄国人相处”中，作者详细叙述了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吉洪诺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历次会谈和秘密传递信息的情况，以及作者对这些人的直观评价。在这中间，作者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特点及其缘由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的改革和对外政策